

姚鹤鸣 著

在历史的 秋千架上

中国新时期文学回顾

6.7

在历史的秋千架上

中国新时期文学回顾

姚鹤鸣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 7.75插页1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61 000 册数: 1-3 000

ISBN 7-300-00933-6

I·61 定价: 3.30元

自序

早在这本书的写作开初，我就曾经与友人谈起过它的总体构想。友人听后，直言不讳地指出，从方法论上讲我是深受丹纳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默认了。

也许是丹纳的《艺术哲学》我读得比较早，印象很深，虽然关于这本著作我们历来对它有肯定，有否定，但我至今对他的研究方法还是极为推崇：第一步把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总体，就是说任何一件艺术品属于艺术家的全部作品；第二步把同时同地的艺术家作为一个总体，一个艺术家总是隶属于他那个“艺术家家族”；第三步把包括艺术家庭本身在内的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特别是如下的一段话我铭记在心：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①正是在丹纳的影响和启迪下，我在撰

①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写本书之前，就确定了我的方法，即从文化意识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切入作文学思潮层次的研究。我的这本书与丹纳的相比，自然是相去甚远，他那严密和完整的学说以及建立在大量史实基础上的详尽论说，以我浅薄的知识根底是不可企及的。

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实在是让人思味无穷。当我们回首十余年文学历程的时候，常常会惊异于其热度、其速度、其变化多端。如此纷繁驳杂而又热闹非凡的文学现象，足以使任何一个热情的文学工作者为之倾倒。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但是也被它迷上了。于是，我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居然“不务正业”地悄悄留心起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当一个偶然的的教学任务临到我的头上的时候，我欣然就开设了新时期文学思潮的选修课。这本书，就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

新时期文学，特别是这一开始十余年的文学，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值得研究的阶段之一。当然，现在作出一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我现在这样做了。愿后人在我的肩上看得更远、更深、更广。

这本书由于是在不断积累的资料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书中某些观点可能会不自觉地认同于同行专家，如果这样的话，敬请原谅。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陈泽春同志的大力帮助，在许多具体问题以至整体构想上她都给予我指点，在此谨致谢意。

姚鹤鸣

1988年12月于苏州

目 录

自序

I — II

上篇 文学所反映的民族心史

第一章 观念的复归	3
一 劫难后的第一阵回响	8
二 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	18
第二章 文化冲突的起始	31
一 现代化变革观念的先声	38
二 由现实引出的问答	52
三 “人”的召唤	66
四 那特殊一代知青的心灵历程	81
五 变革时代的困惑和彷徨	96
第三章 民族文化的自觉反思	109
一 对凝重的传统文化的剖析和批判	115
二 原始英雄主义的追寻	130

I

下篇 文学在自身美学意义上的变迁

第一章 文学上的“拨乱反正”	147
第二章 嬗变、突破和发展	159
一 渐进中的中国现代主义	167
二 现实主义所展现的广阔道路	189
三 悄然走上舞台的浪漫文学	208
四 纪实——文学发展的一种美学趋向	227

上 篇

文学所反映的
民族心史

第一章

观念的复归

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以“伤痕文学”开始的。

但是，文学以揭示“伤痕”为标志的新时期的到来，却并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依仗着政治的力量。因此，要谈到文学的新时期，就不能不首先提到促使这新时期文学发端的重大政治事件。

1976年，农历丙辰龙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称得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则又是具有关键性的转折的一年。偶然的和必然的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给这一年的历史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陨石雨的降落，唐山大地震，鼎立中国政治的三个伟人的相继去世，震惊世界的“四五”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曾经一度左右中国局势的“四人帮”在一夜之间的倾覆，……

然而，历史正是凭借着这些偶然的事件，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着。

1966年至1976年长达十年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对于新生的人民共

和国来讲，则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中国的历史向何处去？也许正应着鲁迅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人民正是在这种沉默之中，悄悄地然而又迅速地滋生着一种反抗的情绪。作为个体的代表是女英雄张志新，她以她的鲜血在寒凝的大地上催发着春华；而作为群体的行动，则是“四五”天安门运动，它以它旋风般的气势震撼着中国的大地，敲响了四人帮垮台的丧钟。终于，时隔半年，历史就按照它的辩证法把四人帮埋进了坟墓。人民胜利了，民族以这一政治的转机才又拨正了前进的方向，被历史学家称谓的新的历史时期也就随之而开始。

文学的历史，和这一段政治的历史，几乎是同步的。

文学家们不会忘记在那“十年”中所出现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文艺这个最富人性、情感性和社会敏感性的东西，被扼杀在政治的高压之下。然而，历史翻到那“十年”的最后两页，这种状况同样有着程度不同的变化，变动情绪也在底层流淌开来。如果作一个类比的话，那么，作为个体的代表是诗人郭小川，他在《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里，抒发了那种战士的情怀：“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这种思考的结果和反抗的激情，虽然是诗人个人的，但在那时，并不乏其普遍性。其后不久，天安门前爆发的诗歌运动，作为群体的觉醒方式，就打破了团泊洼的安静。这是一次特殊的文学运动，它虽是围绕着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悼念而展开

的，但其主旨，无疑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四人帮一伙，强烈地呼吁着民主和进步。请看那首曾被四人帮诬为“反动诗词”的《扬眉剑出鞘》：“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其战斗的锋芒何等锐利！另一篇丙辰清明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文，更鲜明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

1976年发生的“四五”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史上，实在是值得大书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表现在表层政治上的作用，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标志着我们民族理性意识和自主精神的一次新的觉醒。人民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理性支配自己的行动。如果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种精神观念，如果不是对现代迷信的初步破除，人民要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不久即一举粉碎四人帮显然是不可能的。并且，其影响之深远，还波及到1979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以后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外交路线的确立。

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四五”诗歌运动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也引发了新时期理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以及反映改革的文学，无不都是以这种精神观念的内核贯串其中。思考与探索，这两个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所表现的重大主题，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从精神实质上讲，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

但是，这种从“四五”运动中引发的并在新时期最初阶段的文学中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它的内涵和出发点是带着极

大的传统性质的，说准确一点，是 50 年代初期所具备的文化观念形态。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养和确立的革命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内涵的理性精神，人们才那么容易接受并且热情欢呼政治上的重大历史性变动，同时也普遍接纳这一时期文学所表现的生活主题。

当民族性的灾难刚刚结束之后，人们还来不及思考众多的问题。抚摸着四人帮在自己肉体和心灵上留下的一道道伤痕，每一个人首先想到的是控诉和谴责，全民族的灾难酿成了全民族的控诉。这是中华民族十年动乱结下的历史之果。当时，文学上每一篇稍微成功的作品，都在人们心头激起波澜。这一切来得是十分自然而又必然的，因为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既然给人们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它毁坏了共和国缔造的一切，特别是破坏了人们记忆之中最美好的五十年代传统，那么，文学对它的揭露和控诉无论怎样的强烈都不算过份。

继“伤痕文学”之后的对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的文学，其实质同样表现出对心目中这一美好传统的无限留恋。当悲怆的感情在“伤痕文学”中发泄过后，人们的确开始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思考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原因。当作家们重新审视建国以后的 17 年走过的历史行程，虽然发现那也并不是政通人和、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光，发现了在这段历史行程中有着政治上的许多缺陷和弊端，但是，促使作家们作这样的思考、得出种种结论的参照系是什么？仍然是五十年代的文化意识。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当时所有的作品揭露历史弊端的年限都止于 1957 年就可以明白。从

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等一批作品中可以找到众多的这样的形象化例证。

总之，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表现为对50年代的美好时光的怀念。在文学上就表现出某种“回归”的特点。

一 劫难后的第一阵回响

1976年10月，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又一个金色的十月，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终于覆灭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变化的界标，也成了我国文学变动的界标，社会历史新时期的开始，被文学史家称之为文学的新时期也同样就此开始。

这一文学的新时期，如前所述是以“伤痕文学”为其发端的。不过，在人们还没有把目光注视着自己身受的创伤之前，作为文学表现出来的，是反映了人们心理上一种劫难后的短暂欢呼以及对被迫害的老一代革命家的缅怀之情。《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举办的两次诗歌朗诵会，主题就是如此。会上朗诵的郭沫若的《水调歌头》、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一时广为传诵。其时，话剧这一艺术样式也发挥了先锋作用，《曙光》、《丹心谱》、《报童》、《陈毅出山》、《报春花》等，演出后均得到热烈反响。

“欢呼”和“缅怀”之所以成为新时期文学短短的序曲，一方面固然是人们因胜利而喜悦欢笑，还没来得及顾及自身的伤痕，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想——视文艺为歌功颂德的工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自然也只能创作出一些歌颂性的作品，欢呼粉碎四人

帮也好，缅怀老一辈革命家也好，一概如是。

但是，“欢呼”毕竟是暂时的，“缅怀”和“哀思”也不可能长久。一旦人们平静了欣喜若狂之情而关心起现实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自身以及民族所受伤痛来。

刘心武首开其例，一篇《班主任》引发了人们对习以为常然而又极不平常的社会问题的思考。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者日常接触到的都是青少年，他有感于他们被四人帮荼毒了的心灵，发出了焦灼的呼喊：“救救孩子！”他后来投出的几篇小说，如《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人》、《爱情的位置》，虽然提出的是不同的社会问题，但实际上都是在同一方向上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都把目光集中在受了“内伤”的年青一代身上，因而他的呐喊总是：救救孩子！救救年青的一代！

救救孩子，救救年青的一代，固然是刻不容缓的，但何止是孩子、青年呢！有谁能否定自己不被四人帮扭曲了性格？谢惠敏虽然只是个孩子，彭晓雷、邹宇平、亚梅虽然也只是些青年，但是，他们身上所显露出来的精神症状，却是普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许多成年人，甚至上了年纪的人，从谢惠敏等人身上也照见了自已。《班主任》有着它极广泛极典型的意义。

“伤痕文学”在刘心武创作《班主任》之时，还仅仅是开始，待到卢新华发表了《伤痕》一文之后，便开始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创作思潮。卢的这篇短篇小说，倒不是说它本身具有多少永恒的价值，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来讲，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浅显和幼稚。它的贡献，是在于由此而产生的争议在客观上使得人们激起了对以往痛苦的回忆。

也就是说，由于宗教情绪和狂热的行动一下子冷却，在人们的头脑开始清醒之时，《伤痕》的问世推动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批判。在它的带动下，大量主题、题材、风格基本一致的“伤痕文学”涌现出来。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血》、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张弦的《记忆》、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代价》、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宗璞的《三生石》，以及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

在所有的“伤痕文学”中，除了《班主任》外，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值得提一提的。首先一篇自然是卢新华的《伤痕》，作者以较为感人的笔墨描写了母女两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生离死别，是四人帮的莫须有的“叛徒”罪名活活拆散了母女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而给她们两人心头烙下了伤痕。如果说女儿的出走就开始刺伤了母亲的心，直至临终，这种伤痕还难以平复，那么，作为女儿的王晓华，心头的伤痕也许更大更深。作者的立意很明显是继续着刘心武“救救孩子”的呼声去探究四人帮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伤”，诚如作者自己讲的，“四人帮给我们社会留下的最深的伤痕，还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希望《伤痕》能促使读者“冷静地看到伸在王晓华脑子中的那只四人帮的精神黑手”^①。

^① 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载1978年10月14日《文汇报》。

郑义的《枫》是另一内容的作品，它发表的时间比《伤痕》整整早半年。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枫》的声誉并不很高，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其实是相当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历时那么久，和“个人崇拜”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枫》正是通过对“文革”初期的历史背景的真实记录，批判了这一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思想观念。李黔刚和卢丹枫这一对恋人，和当时其他的青年学生一样，曾经是那样狂热地参加“造反”，都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捍卫“革命路线”，然而，正是这种“狂热”和“真诚”，使得他们在彼此对立的两派武斗中白白地流完了自己的血。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代人的悲剧足以引起人们冷静的深思。

描写青年一代的受骗以至精神麻木在“伤痕文学”的开初风行过一时，但不久接连而来的则是大量描写普通人的受难。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就是一篇，虽然它写的是一个近乎三角关系的爱情故事，但是，它把那腥风血雨的年月推到了读者的面前。主人公薛子君在失去了第一个丈夫后，接着又失去了第二个丈夫，然而当两个丈夫同时侥幸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两难了，“天哪！我应该怎么办？”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不太会去回答主人公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更多地是想着回答：是谁让薛子君走了这样一段悲痛的历程又使她陷于这进退维谷的境地。

冯骥才的《啊！》是同题材的另一篇。它写的是一个喜剧形式的悲剧故事，叫人看了想笑又笑不出来。吴仲义这个典型的书呆子，软弱、老实得简直是一个十足的可怜虫，因为丢失了一封关系到自己、哥哥及哥哥的朋友的政治命运的信，坐卧不安，神情紧张，被猎犬一般的“文革新贵”贾大